

中共簡化漢字對語文史地教學之影響

汪學文

壹、前言

中國文字有悠久之歷史，自漢代以後即成定型，始終如一。所謂定型，就構造言，結晶於形聲；就形體言，則結晶於楷書。

而中國文字之演進，約分由兩條道路發展：

一條是繁化，又稱類化。繁化是爲了使字義更爲精密、更爲明確。例如不少假借字加上偏旁，變成形聲字，「侖」加言旁爲「論」、加車旁爲「輪」、加人旁爲「倫」等是，使其產生分別同音字的作用。

一條是簡化，簡化是爲了便於書寫、便于普及，但卻不宜唯簡是從，任意改造，因爲把「後」字簡成「后」字，「乾隆后」就爲雙關語；把「裡」字簡成「里」字，「海里」就爲雙關語，意義反而更爲複雜。基於此，在歷史上的若干簡體字，紛紛恢復爲繁體字，例如孫伯繩和俞運之所編「古代的簡化漢字」（註一）一書，列有簡體字一千五百個，而如今仍然流傳的僅一百一十五個。

要之，簡化與繁化的交互演進，乃是漢字的發展規律，祇能任其自然發展，不宜隨便提倡，更無法全部或大部加以簡化。

然而，共產主義者卻認爲語文既是「人類交際的工具」，也是「社會鬥爭的武器」。因此，中共自竊據大陸以後，即積極推行文字改革，一面陸續簡化漢字，使其紊亂，失去使用價值，一面則實驗拉丁拼音，企圖廢棄漢字，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建立「共產主義文化」。三十餘年來，其實驗和試行的時間實不算短，其使用方法和手段似亦不弱，但是先後卻挫敗多次，時浮時沉。

近數年來，問題則更爲嚴重，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國務院」乃決定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顯示所謂「文字改革」的腳步已告停滯，這是中共蓄意廢棄漢字和破壞中華文化陰謀重大失敗的反映。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至十三日，由「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使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宣稱「漢語拼音方案」並不代替漢字。其主要

原因，正如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會上所說：「當前社會用字比較混亂，濫用繁體字，亂造簡體字，甚至隨便寫錯別字，這是一個教育問題。亂造簡體字，搞得誰也不認識，只有他個人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這對兩個文明建設是很不利的，已經引起國內外各方人士的關注，紛紛提出批評意見。這種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干預和糾正。」（註二）但是，據說在大陸各種場合亂寫字的不在少數，仍然混亂。當年七月初，北平「少年先鋒隊」隊員開展的「讓春風吹走首都街頭錯別字」活動，僅五天就查出錯別字和非正規字二十六萬多處，除確因語文水準所限而致錯外，很大一部份都是有意無意地自造成濫用簡體字。與此相反的是，有些人在當用簡體字時卻又寫成繁體字。（註三）因此，中共「國務院」于當年九月下旬發出通知，同意並轉發「國家語文工作會」所提「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顯然，大陸上反對中共文字改革的大有人在，而且大都置「漢字簡字方案」（按指第一次方案）於不顧。

不過，中共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計簡化五一五字）及一九六四年三月公佈的「簡化字總表」（內包括「漢字簡化方案」中的五一五字，共計二二三六字），仍然推行，其對學校教育、語文教學、史地教學等，都有相當的影響，正如大陸社會一樣，用字混亂，錯誤百出。

貳、中共文字改革方針之矛盾

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一九五一年，毛澤東約集郭沫若等討論文字改革問題時更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基於此，中共文字改革工作者便認為這是「文字改革」的「總路線」、「總方針」。（註四）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時卻宣稱：「首先，應該說清楚，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他尚曾公開地說：「至於漢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它是向著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忙作出結論」。（註五）這種論調，顯然是對文字改革的前途，缺乏信心，而對於拼音的「總方針」並不肯定。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北平召開「文字改革工作座談會」，研究新時期

文字改革的方針和任務。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聽取了關於會議情況的匯報，對文字改革工作提出重要意見，還給參加會議的人員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文字改革工作的繼續前進，需要向社會各方面作有說服力的耐心而持久的宣傳。由於國家在各方面要求現代化，要求高效率，要求普及初級教育和擴大中等與高等教育，以及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廣大，這些不可抗拒的客觀趨勢，終將使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在全國全社會範圍內推廣普通話（同時也就推廣漢語拼音字母）和對漢字繼續進行穩步改革的必要性，這是無可置疑的」；並且強調：「在新的時期，要研究新的問題。進行文字改革，是爲了更好地適應現代化社會和文化科技發展與發達的需要，我們並不企圖消滅漢字。人們不必有此擔心。」而該座談會則指出：「今後我國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針仍然是：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我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漢字和拼音文字並存，各自發揮其長處，相互彌補其不足，共同爲現代化建設服務」。（註六）無疑的，這種意見和決議，對於拼音的「總方針」仍然不肯定。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共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乃正式宣佈：「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幫助學習漢語、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注音工具』。這就是說，它只是代替『注音符號』的功用，但

是拉丁字母形體跟漢字不調和，拼音往往須用較多字母，以致如今中共報刊仍難以拉丁字母爲漢字注音，更無法編印類似我們的字字注音的「國語日報」，而使它的推展趨于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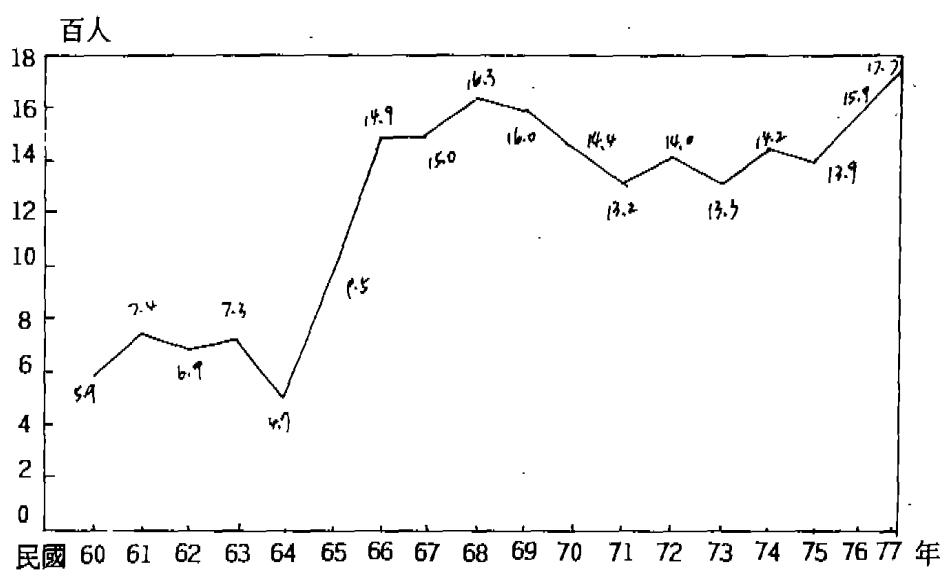
由上可見，中共文字改革的「總方針」，是矛盾的，始終沒有確實地肯定，以致所謂「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遙遙無期。基於此，中共簡化漢字工作將更久更亂，使得語文教學受到很大影響，甚至阻礙了識字運動的廣泛推展，使得新文盲不斷地增加，形成文化的悲劇！

參、簡體字對學校教育之影響

中共的文字改革以學校爲主要的推行陣地，因而學校教育首先遭到影響：

就漢字簡化而言，據基達在「上海語文教師座談簡化漢字和拼音教學問題」一文中指出：「學校語文課教師把沒有公佈的簡化字作爲錯別字，可是別課的教師卻在黑板上大寫這一類的簡化字，而且各課有各課的簡化字，數學教師一般都把『數』寫成『攷』，物理或化學教師一般都把『量』寫成『量』。還有的教師仍舊念念不忘繁體字。同是教師，寫字的規格就不一致，學生不知所從，經常以此責問語文教師」；「學生經常對語文教師有這樣的意見：『外面用的字，

(三) 歷年海外青年回國觀摩人數



老師不教；老師教的字，外面不用」。社會用字不規範化，學校的正字教學就變得脫離實際了」。（註七）

這種混亂現象，不僅對識字教學有影響，而且對整個學校教育亦必發生影響。

就漢語拼音化而言，據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召開之「漢字改革座談會」透露：「大學或師範畢業生去當中小學教師，還要臨時突擊學習一下拼音字母」；「有的家長提意見，認為教學拼音是增加負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用處不大，用拼音的機會太少了」。（註八）

由上可見，「拼音」教學，對師生都是負擔；負擔加重，自必影響教學的質量。

肆、簡體字對語文教學之影響

中共簡化漢字對於語文教學、特別對於古代語文教學，具有相當的影響。

大陸知識份子曹伯韓在「文字與文字學」一文中指出：漢字與古義及音韻有密切關係，他說：「文字學現在雖然只研究字形，但是它跟音韻學、訓詁學還是密切相關的。因為漢字跟拼音文字的字母不同，字母在未拼成詞時，談不上詞的意義和音韻，漢字每個字差不多都表示一個詞（現在不是

詞的在古代是詞），但在使用過程中又有種種變化，如用來表示另外的詞（假借），改變讀音等等，所以字形跟語詞音義的關係及這種關係的演變也是文字學所必須注意的問題。」（註九）

因此，古代語文雖有距離，但是一般文獻和書籍，總難免參雜古語，漢字如有變更，則對於古代語文必將發生影響。而大陸知識份子對於此項問題，亦曾陸續地予以爭論：

一九五七年，中共「文字改革」月刊即曾發表專文，認為：文言用簡字，難免混淆不清、發生誤解。例如秋陵在「從簡體字想起的」一文中，提出反對意見如下：

「我是非常反對在翻印古籍中用簡體字的。那怕是片斷的引用，或一、二篇的轉載，都以不用簡體字為好。國務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所通過的『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中也曾指出，『翻印古典作品中，或者在其他的文章中引用古書的時候，就常常用簡體字來印刷。特別是現在的中學文學課本所有的古典作品，都是用的簡體字。我覺得這是很不妥當的。因為古典作品中本本已有許多通用假借轉意的字（詞），如果再摻雜一些簡體字進去，那就不但使讀者在閱讀時要多方照顧，隨時付度，不勝麻煩；同時還容易使原來的意義混淆不清，反而增加讀者的困難，在學校裡也就增加了教學的困難。」

秋陵並從兩方面舉實例說明如下：

（一）從通用假借字（詞）的方面來看：

- 1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詩經：氓）
- 2 「命女三宿，女中宿至。」（左傳）
- 3 「其辟君三舍。」（左傳）
- 4 「乘舲船余上沅兮。」（涉江）
- 5 「以責賜諸民。」（戰國策：齊策）
- 6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
- 7 「侯生果北鄉自剄。」（史記：信陵君列傳）
- 8 「景翳翳以將入。」（歸去來辭）

上面這些句子，乃是摘自當時大陸「高中文學課本」。

這些句子中的「匪」、「女」、「辟」、「余」、「責」、「馮」、「鄉」、「景」等字，都是古代作家所常用的，但是它們的意義卻已不是這些字現代的含義了。這樣就已經使初學者不易清楚，現在又把簡體字用進去，使人誤以為「辟」是「闢」的簡寫，「余」是「餘」的簡化，那怎麼不會使讀者感到句子不清，意義含混，以致理解困難，甚至弄出笑話來呢！

（二）從繁簡字體的混淆上來看：

1 「辟」與「闢」

「不能以辟馬毀車致遠。」（荀子：正論）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皆州自辟除。」（通典）

前一句的「辟」字脚有毛病的意思，後一句的「辟」是征辟、任用的意思，都不是簡體字，如把它們認為是「闢」字的簡化，就會誤解原意。

2 「借」與「藉」

「藉藉蕪之織草。」（文選：遊天台山賦）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田千畝。」（禮記：祭儀）

前一句「藉」字是坐臥的意思，後一句「藉田」，是天子親自耕種之田。這兩句如果用了簡體字「借」，讀者以「借」字的本意去理解，就會大誤。

3 「舍」與「捨」

「舍之上舍。」（戰國策：齊策）

「亦不遑舍。」（小雅）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漢書：季布傳）

這三句中的「舍」字，均非「捨」的簡寫。第一句的前一個「舍」字有「止人宿」之意，第二句的「舍」字是休息，第三句的「舍匿」是收留藏匿的意思，所以均不可誤爲「捨」字的簡化。

4 「郁」與「鬱」

「敘溫郁則寒谷成喧。」（劉峻：廣絕交論）

「香臭芬鬱。」（荀子：正名）

第一句「郁」訓「煖」，不能誤爲「鬱」字的簡寫；第二句「鬱」訓「臭」，如果寫成「郁」字，就可能被誤作芳

香了。寫法不同，意義出入之大可見。

5 「復」與「復」「復」「覆」

「紅羅複斗帳。」（孔雀東南飛）

「水灑復泥封。」（白居易：買花）

「君爲三覆以待之。」（左傳）

上面三句中，復、複、覆都有其不同的意義，特別是「紅羅複斗帳」一句，「複斗帳」具有「覆斗帳」的意義；「君爲三覆以待之」的「覆」卻是作爲「伏兵」解，如果都寫成「復」字，也就不易辨別它的正確意義了。

6 「干」與「乾」「幹」

「舞干羽于兩階。」（書：大禹謨）

「其敢干大禮以自取其戾。」（左傳）

這兩句的「干」字均非簡體字。前一句的「干」字是舞者所執之物，後句的「干」字是干犯的意思。如果在前句誤爲「乾」的簡寫，後句誤爲「幹」字的簡寫，可以想見意思也就天差地別大有出入了。

7 「斗」與「鬪」、「余」與「餘」、「發」與「髮」

「秉」與「隸」、「谷」與「穀」、「折」與「摺」

「孤城落日斗兵稀。」（燕歌行）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古詩十九首）

「溘埃風余上征。」（離騷）

「余音嫋嫋，不絕如縷。」（前赤壁賦）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涉江）

「士有秉子弟。」（傳）

「祖之所秉聞也。」（公羊傳）

「飄風發發。」（詩經：蓼莪）

「余發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左傳）

「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群，谷量之。」（爾朱榮傳）

「何以報不谷。」（左傳）

「卿直以折簡召我。」（三國誌魏志）

「折脇折齒。」（史記：范雎傳）

從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簡體字在古書中的混淆作用是很大的，初學者實無法辨別「斗、鬪」、「余、餘」、「發、髮」、「秉、隸」、「谷、穀」、「折、摺」的正確用處和作用。何況，這些字之間到底還不能夠等同起來，「曲面」究竟不是「麵麵」、「發白」也不是「髮白」、「制裁」不同於「製裁」、「颱風」不就是「台風」、如果爲了要推行簡體字，而在古代文言作品的翻印中就毫無考慮地使用起來，對幫助青年人學習文言和文學是沒有好處的。（註十）

關於秋陵在「從簡體字想起的」一文中所引這些無法辨別的例子，實爲中共「漢字簡化方案」中所列的，業已簡化，因而其對因古代語文教學已經發生問題，使得師生之講解

與學習都有不良的影響。

一九六二年，中共「光明日報」之「文字改革」雙周刊，又討論「文言能不能用簡化漢字」問題，計有贊成、反對、及折衷等三種意見。折衷意見主張部份古書以簡化字重印，部份保留本來面目，察其原意，似在力求固有文化得以保存若干，其用心實良苦。贊成者所提理由，多從政治觀點出發，殊覺牽強膚淺；而反對者之立論，則多從文化觀點出發，言之有物，一針見血，值得引述：

1 「古書是我國的文化遺產，繁體字亦是文化遺產，應與古書配合，保存其本來面目，以資研究。」（十月二十六日該報）

2 「一個人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後，他就不能不接觸到繁體字，儘管學了簡體字又學繁體字是增加麻煩。他不可能不讀還沒有全部使用簡體字的報紙雜誌，他不可能不讀『漢字簡化方案』公佈以前印的、寫的書刊、文件、材料。」（十月三十一日該報）而且，「若重印古書就用簡體字，將來簡體字一批一批地增加起來，所印的書反而弄得繁簡雜亂，倒不如乾脆保留原字。」（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報）

3 「排印文言用簡化字，其中有的簡化字原來分爲兩形，各具一義，簡化之後，合爲一形，包括兩義，這

樣的簡化字，理解上有障礙，不便于閱讀」。如「尙書」中「一日二日萬幾」句之「幾」字，有「精微」、「深微」之意，簡化漢字中之「几」字，則無此涵義，因此「尙書」中之「幾」字當不能以「几」字代替。（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二日該報）

4 很多簡體字在一般情況下與繁體字可以通用，但有時則不能以簡體字代替繁體字，如「仇」與「讎」是。「戰國策」所載燕昭王之話，有「燕欲報仇讎于齊」句，如將「讎」改印爲「仇」，則「仇讎」即成「仇仇」，此種改法，即不妥當。（十一月十二日該報）

一九七四年，大陸知識份子對此項問題仍有爭論，有人認爲：「當我們在處理同音字歸併的時候，既要考慮到在現代普通話裡是否同音，也要考慮到在古代是否同音。如果只在現代普通話裡是同音字，而在古代卻不是同音字，就不能歸併」。有人則指這條「古音不同的字一般不能歸併」的原則不能成立，認爲「閱讀古代文獻，有時要認識某些繁體字、異體字、通借字，甚至甲文、金文，與現代運用漢字作爲書面交際工具是兩回事」；「精簡合併同音字不必考慮古音，猶如簡化漢字不必考慮寫文言文，同樣是漢字簡化工作中的重要原則問題」。（註十一）

由上可見，中共簡化漢字對於古代文言是有相當影響的，因而中共特別強調其爲原則問題和方向問題，並繼續展開同音字去留的問題。

至於簡體字對於現代白話文，也有相當的影響。中共雖然認爲「同音代替」是漢字簡化的「多快好省法」，但是，實際上採用同音代替的簡字，大都在意義上發生混淆、造成誤會。例如：「隻」簡爲「只」，則「許多船只通過蘇伊士運河」，即使因上下文的關係不致過多地產生兩歧了解，也會引起閱讀上阻斷作用而分散精力，浪費時間。而且在字形上，簡體字往往相似繁體字，特別在書寫時往往會產生混淆。因此，中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二月開始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小學語文課本」，特別列有「認一認」專欄，以比較字形相似之繁簡，例如正體的「外」和簡體的「處」，就列入作比較，以便於學生的認識。無疑的，這足以增加學生識字的負擔，而且影響語文的初級教學。

伍、簡體字對史地教學之影響

(一) 簡體字對歷史教學之影響——中國文字與中國歷史，具有一種不可分離之關係。在中國歷史上，文字鞏固了民族之統一，並使中國歷史成爲世界上最完整之歷史。

國父在「孫文學說」中，曾明白指出：

中共簡化漢字對語文史地教學之影響

「夫文字爲思想傳授之中介，與錢幣爲貨物交換之中介，其用正相類，必廢去中國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記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註十二）

其實，中共對於文字與歷史之關係，亦並非漠然無知，例如曹伯韓在「文字和文字學」一文中即曾指出：

「文字學跟史學有一定的關係。在研究古代史料的時候，有些書籍上的文字要經過科學的解釋，才能讀懂。甲骨文辭、銅器銘文等也是一些史料，這上面的文字經過考釋之後，就可以憑它來研究當時的經濟政治情況」；「古文字學又跟考古學相聯繫，因爲它研究的對象就是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古物上的文字，這種研究形成考古工作的一部份。」（註十三）

然而，中共卻不惜付出影響甚至毀滅歷史之代價，簡化漢字並企圖推行拼音文字。因此，大陸上反對中共簡化字者，不僅大有人在，而且極爲尖銳。例如，「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翦伯贊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共「文字改革委員會」舉行之「第一次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上，曾公開指出：

「由於文字是歷史的產物，在進行文改時就必須照顧文字演變的歷史傾向。照我看來，文字演變的歷史傾向有兩條

：

1 字的結構，由繁而簡；

2 字的含義，由簡而繁。

因此當我們進行文字改革的時候就不能一味從減少筆畫著想，還要想到因減少筆畫而引起的對字義的影響。」（註十四）而且他尚指出：

「文字改革改得我們歷史學的研究工作都無法作下去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沒有走群眾路線，有關文字改革的一些方案在報上發表，就要大家實行，雖然文字改革委員會也曾組織過一些討論，但是很不普遍，參加討論的人的意見也是一邊倒的。原因是有些人怕被扣帽子，怕被認為是：反對政府既定的政策，反對黨。：：我激烈反對廢除漢字，要廢除漢字，除非決心把歷代文化遺產丟掉不要，從野蠻人幹起。」（註十五）

又如大陸上另有人指出：「我們文化悠久，用漢字記載的歷史文獻非常豐富，漢字一脈相承。作為質量精減以後的一套完整漢字，不僅應當適應現代人記錄語言的需要，同時也應當考慮重印古書的需要。」（註十六）

以上這些論點，都強調中國文字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一旦漢字簡化或拼音化則對於歷史研究、以及歷史教學都有不良的影響。

（二）簡體字對地理教學之影響——至於中國文字與中國

地理，也具有相當之關係，但是中共照樣主張改換生僻地名用字。中共曾指出：「地名是千百萬人每天都要使用的：要看（地圖、報紙上的地名），要寫（公文、信件中的地名），要說還要聽（廣播、電話中的地名）」，因此，「改換生僻地名用字可以壓縮通用漢字的數量，有利於各地群眾的來往接觸和聯繫」。（註十七）

在改換生僻地名用字方面，中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曾向大陸部份省、市、縣發出「更改一部份生僻地名用字的建議」，建議更改二十省中八十一縣鎮的地名用字。到一九六五年止，經「國務院」批准實行了第一批（計三十八個），如陝西省的「塹厓」改為「周至」、「商雒」改為「商洛」。據說，當時縣市級的名稱要用簡化的字，至少還有一百五十多個，例如河北省的「薊縣」「蠡縣」「蔚縣」將改為「季縣」「里縣」「玉縣」，安徽省的「毫縣」「歙縣」將改為「博縣」「舍縣」。此外，一些山水的名字，例如「崆峒山」「崆峒山」「沅江」「潯河」，它們的山字旁、水字旁也將去掉，而寫成「查牙山」「空同山」「元江」「師河」。（註十八）

生僻地名用字的改換，經中共正式批准的雖不多，但所謂簡化書寫的卻不少，以致造成混亂現象。據中共「郵電部」部長朱學範指出：「有時在個別單冊、標簽上，還偶而出現用數碼字的諧音代替地名，把湖南零陵寫成『〇〇』，滬

寧線上的威墅堰寫作『741』。這種寫法顯然極不合理，會使人困惑不解。：：某些地名的簡化書寫，在甲地即使有較多的人了解，但到乙地卻不通行，勢必造成通信上的稽延和差錯。因此，對於不合規定的簡筆字，郵電部門歷來是反對的。）（註十九）

而對於所謂「合規定的簡筆字」，用以改換生僻地名，也有人反對。中共「光明日報」的「文字改革」雙月欄，曾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起，開闢「關於改換生僻地名用字的討論」專欄，展開討論。就在這天的報上，刊載了若干反對意見。例如：

劉華中在「不能只為方便而改」一文中指出：「地名當中有相當一部份是有來歷的，不是隨便起的。它是同該地區的地理狀況和歷史為實有聯繫。如『汨羅』這一地名，史書上有這樣的考證：據『應劭注』云：『汨水在羅，故名』。據『廣湖南考古略』：汨水自江西境流入湖南後，經平江縣之古羅國山，相傳為古羅國舊址，始稱汨羅。再據『漢書地理志長沙羅國注』云：湘陽縣北之屈潭，即屈原自沉之所，相傳其左邊有古羅國故城。綜此三說，均以汨為水名，以羅為地名。如果現在不顧上述情況，而把『汨羅』改為『密羅』，那怎麼還能體現其歷史淵源呢？何況這樣改，也未必受當地人民歡迎。因為許多地名的歷史和傳奇故事已在人民中間傳為美談。如屈原『自投汨羅以死』的歷史事件，至今人

們還是以傳統的形式來紀念他。

這裡只是舉一個例子而已，其他還有些地名也無不如此。」「不僅如此，尤其是那些一直在歷史上起著重要作用的地名更不能隨便改換。如（本報所載的）：：榮陽、碭山、澠池、鄆陵等地名，現在要是把『榮陽』改為『興陽』，把『碭山』改為『當山』，：：那麼，誰還能一看就想起『興陽』原來就是明崇禎八年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會於榮陽，商討對敵戰略的地方呢？誰還能知道『當山』原來是歷史上第一個農民起義領袖陳涉的葬身之地呢？這樣改了，實際上不會給更多的人帶來方便。」

更有人提出反對的理由云：「有些地名跟我國歷史事實有聯繫，改換了常用的就看不出那個地名的歷史淵源了。還有，有些地名跟當地的高山或者河流有關，換了字，這個特點就損失了。例如，邠縣，古代是個國家，『孟子』梁惠王篇『昔日太王居邠』，就是居在這個邠國。現在改為彬縣，跟『太王居邠』聯不起來了。『沔縣』改為『勉縣』，跟史地上的『沔水』，劉備即漢中王的『沔陽』，都聯不起來了。新疆的『婁羌』，原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改為『若羌』，在古書上就不好查了。江西省的『新淦縣』改為『新干縣』，跟『淦水』的關係看不出來了。貴州『湄水縣』的『湄』，是一種魚，就是泥鰍，『湄水』大概就是『山海經』裡所說『多鰐鰕之魚』的一條河。現在改『湄水縣』為『習水縣』

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恐怕會帶來一些困難。」

由上可知，中共「改換生僻地名用字」的措施，早已引起大陸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反對。如今，中共竟實用所謂地名拉丁化，大陸人名和知識份子實更爲不滿。

至於中共「改換生僻地名」使用「常用字」，就是「同音代替」，實際上也就是俗語所云之「寫別字」。而「同音代替」，更是中共簡化漢字的一種方法。

由於以「常用字」改換「生僻地名」，大都影響其原有來歷和地理狀況，以致在各級學校中的地理教學上，發生很大的阻礙與困擾，對師生都非常不利。

陸、大陸漢字之混亂

中共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公佈「漢字簡化方案」後，乃在出版物上先行試用。由於簡化得離譜，爲簡化而簡化，以致大陸知識份子、甚至工農份子，紛紛表示不滿，提出批評：

—以「旦」代「蛋」，那麼「元旦」會使人誤會爲「完蛋」。

—以「元」代「圓」，那麼「公元」二字是指「公曆紀元」、還是指「公園」，就很難理解。

—以「澡」代「操」，顯有資產階級色彩，因爲他們有

的早晨洗澡，而工農份子勞動一天，都要到晚間才能洗澡。

至於大陸知識份子對於漢字的使用，約有兩種現象：一是寫字不願練好字，提倡文字規範也很少涉及書法，以爲不亂寫錯別字便是規範化了；二是學書法不願寫規範字，甚至以古爲美、以異爲雅，未寫異體字和繁體字。（註二十）以致大陸社會上一般用字常有下幾種情況：

1 「漢字簡化方案」的簡化字不用，偏偏要寫繁體字，或寫已經廢止的異體字。

2 就是不寫正式公佈的簡化字，而亂造或新造簡體字。有的字造得十分離奇，一般人沒法認識，如「夙」（夙）、「疥」（瘡）等；有的乾脆用象形代字，如「月〇（餅）」、「山△（峰）」等。

3 隨便寫錯別字的情況相當普遍。

4 繁體字和簡體字並用，正體字和錯別字混雜。

5 胡寫不倫不類的怪字，如「彡」（工）、「△」（山）等。

6 漢語拼音字也拼寫錯誤，比較普遍的是每個音節都分寫、或者所有音節都連寫。（註二十一）

而大陸大學生，甚至文科大學生還經常寫錯字，如把「韭菜」寫成「芘菜」、把「花椒」寫成「花交」的例子並不罕見。即使有一本「新華字典」，也總是束之抽屜，遇有不

會寫或提筆忘了的字，寧可信手揮出個「似手彷彿」的字，也不願費點氣力去查一查。（註二十二）

近年來，大陸社會用字混亂，濫用繁體字、亂造簡體字、寫錯別字的現象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橫行成災的程度。例如：

1. 中共「光明日報」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社論「努力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中指出：最近一個時期，社會用字比較混亂，已經被簡化了的繁體字重新出現，有少數電影、電視片，字幕都是繁體字，致使青少年看不懂；某城市的一條街道，新修飾門面的商店有四十家，其中三十五家的招牌用繁體字。另一種情況是亂造簡化字，某地一條街的店鋪，一個「富」字，就有「𠂔」、「𠂕」、「𠂖」三種寫法，而「旅社」二字則被寫為「侶社」。群眾紛紛議論說：「我們中國人看自己的文字，還得邊看邊猜，懂漢語的外國人看了恐怕更不知道這是什麼了。」因此，如果再推行新的簡化字，對社會應用勢必造成不便。

2. 江帆在漫畫「秀才認字」中的四幅畫，分別所註之漢字為「此站不仃」、「旅客之灾」、「个堂」、「𠂔所」（註二十三）。這就是說，將「停」、「家」、「食」、「廁」四字分別簡化為「仃」、「灾」、「𠂔」、「𠂔」，使得「秀才」去認，也得猜一猜。

3. 宣博嘉在短文「救救漢字」中指出：文字雜語使人費猜，現代倉頡頗不乏人，錯別字俯拾皆是，不免使人憂心忡忡！我們經常見到的「異體漢字」，多數是以「音」「形」害「義」。更有甚者，是文字的「創造發明」，錯別字屢見不鮮，試分類舉例如下：

一類是諧音錯字：如「仝」（童）、「介」（解）、「伙」（貨）、「刁」（雕）、「反加」（番茄）。「𠂔」（密）、「杰」（想）、「𠂔」（宣）。三類是杜撰錯字：如「𠂔」（帽）、「𠂔」（懂）、「𠂔」（整）、「𠂔」（意）、「𠂔」（菜）。四類是純錯別字：如「弗」（費）、「𠂔」（酒）、「𠂔」（葡萄）。

宣氏並謂：記得數年前，有一下鄉知識青年給家中寫信說「有些同學上吊了，我已想上吊」，父母接信後急得要死，趕到鄉下問他為何要上吊，原來他把「調」字簡寫成「吊」字，一字之訛，幾手送掉父母的老命。（註二十四）

由上可見，大陸社會上的文字，相當混亂，而其造成混亂者，有知識份子和民眾，也有學生。基於此，學校與社會勢必產生相互影響，以致造成惡習循環，使得學校語文教學，難以按正規化進行。

柒、大陸知識份子對漢字簡化之觀點

中共「漢字現代化研究會」與「人民日報」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平共同舉行「漢字研究座談會」，大多數學者認為漢字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文字之一，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巨大威力，因而對於個別字的簡化是否得當，方塊字與拼音文字孰優孰劣，漢字是否要走拉丁化的道路等問題，都有爭論（註二十五）；而大陸上的一般知識份子、以及教育界的教師和學生，對於簡化漢字亦紛紛提出不同的觀點：

大陸「北京大學」教授朱德熙在「關於漢字的優點和缺點」一文中指出：「談到簡化字的問題，我認為漢字本身就有一種簡化趨勢。不管我們是否人為地去制訂簡化字，總會不斷地有一些新的簡化字出現。有的保存下來，有的被淘汰。回顧一下漢字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過去制訂簡化字的經驗證明，簡化字不一定是筆劃越少越好。筆劃少的字有時反而不容易分清，例如：『已經』的『已』，『自己』的『己』和『辰巳午未』的『巳』字形近似，很容易弄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簡化了一個字，原來那個字並不能

廢除，結果是異體字的數量增加了，這更加重了中小學生的負擔。目前應該讓簡化字穩定下來，不要再繼續制訂新的簡化字。過去公佈的簡化字裡，有的不太合理，那也只能將錯就錯。要是再改來改去，那就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亂。」（註二十六）

顯然，這段文章有兩個特點，一是認為漢字應讓它自然發展，不應人為地簡化；二是強調中小學生學了簡體字，還得學繁體字，實為一項重大的負擔。

中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田東平在「漢字改革對圖書館工作的影響」一文中，認為簡化漢字對圖書館工作的影響有三：

（一）對目錄體系的影响——目前有些圖書館，繁簡字在一起的不是個別現象，如「漢」、「漢」、「蘇」……混在一起，讀者和工作人員很不方便。為繁體字製簡體字卡片，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藏書量越大，工程量越大。

（二）影響出納工作——由於時間的推移，出納工作人員逐漸年輕化，他們學的是簡體字，很少有人懂繁體字，讀者識字面卻寬，繁體字書名也很多，有人寫了繁體字書名，就找不到書，雖有些字如「紅」、「紅」繁簡體很接近，但畢竟有為數不少的字，繁簡字形變化很大，如「万」和「萬」，

「关」和「關」字等等，這就難怪前幾年鄧廣銘教授提到北大圖書館沒有「后汉書」，因為年輕人不認得書庫裡繁體字「後漢書」三字，這可以說簡化漢字給圖書館工作造成的典型困難之一。

(三) 影響讀者的閱讀和研究——有些青年好學者，深感一些學術歷史淵源很深，想看一看過去出版的有關書籍，但拿到「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補」(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者)、「孔子教育哲學」：：因繁體字與簡體字差異太大，無法讀下去。(註二十七)

這三點，簡單地說，簡體字對於大學圖書館人員的工作、教授的研究(特別是借書)、以及大學生的閱讀，都有不良的影響。

大陸留美學生羅道在「漢字改革隨想」一文中指出：經驗告訴我們：從小學習簡化字的一代人掌握的漢字往往比不上學歷相同、從小學習繁體字的上一輩；從小使用簡化字的大陸學生也不見得比年齡相仿的港台學生多識字。若把漢字人為地「化」為拉丁語，亦即切斷了它的歷史根源、抽掉了它的文化背景、架空了它的群眾基礎，枯謁了億萬人民對它深厚的感情，那就無異于葬送了它的前途。而一個失去文字的民族還會有大的希望？當今的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漢字輸入電腦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實用性成果。總之，

漢字是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文明的見證與文化的積累，也是當今海內外幾十億學習和使用這種文字的人的共同財富。漢字的改革切忌閉門造車，更忌以少數人的意志為意志。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應該發動各行各業，各個文化層次、各類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磋商、集思廣益、權衡利弊。漢字在今天並沒有阻礙科學的發展，並沒拖中國走向世界的後腿，因而不必對它大加撻伐，更不應在作充分的研究和全面的論證之前對它隨意肢解。既然它還在較好地服務我們，我們就應該尊重它、愛護它，以不變應萬變。(註二十八)

無疑的，這名大陸留美學生的論點，對於正體漢字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而對於簡體漢字的缺點，則是一針見血，且以台海兩岸學生識字情況作比較，以資證實。

大陸「漢字現代化研究會」會長袁曉園在「識繁寫簡、書同文字、共識互信、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一文中指出：「文字不統一，對祖國的和平統一也是不利的。陳立夫先生最近在台灣提出『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園認為文化的基礎是文字，在創辦『漢字現代化研究會』時曾提出：如果中國沒有統一的文字，就沒有統一的中國。園認為文化的基礎，就沒有統一的中國。立夫先生之言至為中肯。目前台灣及海外回大陸的青年，閱讀國內的報刊書籍深感吃力，常常是略略一翻就放下。大陸學生到海外，看繁體字也很吃力。同時炎黃子孫，受著同樣傳統文化的熏陶，為什麼不想辦法突破這

種障礙，讓大家彼此共享中華民族的文化成果呢？」「西方的字母文字有印刷體和手寫體的區別，A和a毫無相似之處。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繁體正字作為印刷體，把簡化字作為手寫體呢？」「日前偶然翻到一九五五年台灣出版的『中國文字論集』，內中提到于右任老前輩曾有『印刷用楷，書寫用草』之提議，正與國所倡議之『識繁寫簡』不謀而合。于老先生擅長草書，所以說『書寫用草』。用草用簡目的都在求其簡易迅速。繁體正字有傳統可循，有六書字理，認識簡體再學會繁體，該是容易得到認識的。繁體易認不易寫，簡體易寫而無字理，初學者並不易記憶，因此認繁識簡，對於傳播傳統優良文化是大有裨益的。」（註二十九）

據說，袁曉園的觀點在大陸已有反映，認為「識繁寫簡」是行得通的。而所謂「識繁寫簡」，也就是「印刷宜用正體字，書寫可用簡體字」，如此則有利而無弊。事實上，在台灣的知识份子，不僅大都「識繁寫簡」，而且更有寫行書或草書的自由，非常方便。

捌、結語

文字乃是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在人類未有文字以前，可說無文化之可言。思想無形，語言流動，端賴文字為之凝固、為之定形；而文化的廣布萬里和流傳千

年，亦惟文字是賴。因此，文字不僅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交流思想的媒介，更是發展文化的動力。

我國文字，發明最早，布用亦廣，自漢代以後即成定型，純一整齊，結晶于形聲，且可「望文生義」。基於此，漢字不宜任意更改、隨便簡化。

就漢字特點而言，乃是形、音、義三結合的文字。如果簡化漢字，則筆劃越簡，近形越多；新造聲旁，聲調難準；同音代替，意義易混。筆劃簡化如果造成形體難辨、讀音繁化、意義混亂那就得不償失。這就是說，簡化漢字，對於形、音、義都有影響，甚至增加了字音和字義，引起新的矛盾，使得學習反而困難。

然而，中共卻一貫地簡化漢字，甚至企圖改走拼音文字方向。但是，中共簡化漢字已歷時三十餘年，時浮時沉，不僅未能完成計劃，反而趨于僵局，出現癥結和混亂：就文字言，影響了漢字的形、音、義；就文化言，影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就教育言，影響了語文教學、史地教學、以及有關學科之教學，使得學生增加學習的負擔與麻煩。

總而言之，漢字乃是中華文化的結晶，鞏固了民族的統一，其與中國歷史地理，更具有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有人說，學二十六個字母的英文是先易後難，因為詞彙量太大，新字不斷地出現；而學方塊漢字則先難後易，學會兩三千常用字，幾乎無往不利，因為漢語詞彙是靠常用單字組成的，

如「太空人」、「太空衣」等，不必另造新字新詞。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腦，已經證明漢字的結構，優於印歐語文結構，漢字將成為繼英文之後的人類第二大電腦語文。

基於此，對於漢字，中國人不宜任意簡化它，更不應打亂它甚至廢棄它，而應該好好地使用它、愛護它和發揚它。

（作者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註釋

- 註一 中共「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
- 註二 萬里：「加強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共「人民日報」（大陸版），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三版。
- 註三 佚名：「吹走錯別字」，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第二版。
- 註四 中共「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匯編」，北平「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頁五。
- 註五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
- 註六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 註七 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 註八 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註九 中共「語文學習」月刊，一九五八年七月號頁二三。

註十 中共「文字改革」月刊，一九五七年九月號頁二五至二七。

註十一 中共「文字改革出版社」編：「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一九七四年十月北平第一版頁五七、六七。

註十二 「孫文學說」，總理全書之二，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二年出版，第三章頁四五至四七。

註十三 同註九，頁二三、二六。

註十四 中共「拼音」月刊，一九五七年七月號頁五。

註十五 中共「光明日報」，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註十六 同註十一，頁五七。

註十七 中共「文字改革」月刊，一九六五年一月號頁一七。

註十八 同註十一，頁六一至六二。

註十九 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註二十 周一農：「漢字規範與書法」，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第四版。

註廿一 陳章太：「談社會用字的規範」，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第四版。

註廿二 劉雪慧：「淺談學生寫錯字的原因」，中共「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第四版。

註廿三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七版。

註廿四 北平「團結報」，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註廿五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註廿六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版。

註廿七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版。

註廿八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註廿九 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二版。

【作者簡介】汪學文先生，安徽省繁昌縣人，國立政治大學

東亞所研究班畢業，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研究員。